

# 崇庆皇太后画像的新发现

## ——姚文瀚画《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

林 姝

**内容提要**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故 6541”号文物，原定名“清人画颀琰万寿图”，本文通过图像对比，结合乾隆朝历史档案，论证该图实为《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作者为姚文瀚。此文物的重新定名和图像分析，弥补了崇庆皇太后八旬庆典图的缺失，增强了崇庆皇太后庆寿图的完整性。

**关键词** 故 6541 崇庆皇太后八旬 慈宁宫 寿安宫 姚文瀚 嘉庆图

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为乾隆皇帝的生母，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693年1月1日—1777年3月2日）。“母仪尊养四十二年”<sup>①</sup>，福寿双全，享年八十六岁，是中国古代皇太后中最长寿者之一。乾隆皇帝以孝行垂范天下，尊母亲为天下圣母。皇太后的生辰为十一月二十五日，称之为“圣寿节”，届时必行庆贺之礼。逢旬的大庆更是无与伦比，六旬、七旬、八旬大寿，均加上徽号，八方来朝，举国欢庆，乾隆帝撰文赋诗，御笔书画，亲率皇子、皇孙彩衣起舞。与此同时，乾隆帝下令宫廷画家以图像的形式记录庆典的宏大场面。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人画《崇庆皇太后万寿图》卷即为六旬庆典图像，《臚欢荟景图》册则为七旬大庆图像，却惟独不见八旬万寿庆典图像，颇令人费解。

为纪念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2015年将在午门展厅举办《普天同庆清代万寿庆典展》，展览所选文物中有“清人画颀琰万寿图像”，笔者闻讯赶至文保科技部观摹修复前作品，发现所谓该作品实为一直没有找到的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该文物应更名为“姚文瀚画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图一〕，下文将从几个方面逐层加以分析。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二五，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庚寅。

〔图一〕《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



## 一 图像概况

“清人画颀琰万寿图像轴”文物号为“故6541”，登记底账名为“清人画颀琰万寿像横轴”。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的登记号为“天一三四七”，名称为“万寿图大幅一幅”，登记地点为乾清宫西暖阁<sup>〔1〕</sup>。该图绢本设色，画心纵219厘米，横285厘米，四周托裱二寸蓝绫边，呈贴落状。所谓贴落，可画可书，宜大宜小，大者可以与整面墙壁相合。既可上墙托贴，用于装饰宫殿墙壁，必要时又可揭落下来，以致重新装裱为卷轴保存。该图所呈现状为由某宫殿墙上揭落而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置的状态。

该贴落内容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画大殿内寿者及祝寿的人群。坐北朝南的黄琉璃瓦大殿七间，不设门扉，内景洞开，殿内正中设三出陛高地平，上铺黄地红花毡毯，主角为身穿清代朝服、头戴凤冠、耳饰金龙衔珠珥的高龄妇人，端坐于粉红地云鹤纹屏风前的宝座上，座前为摆满各式

〔1〕 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一编第一册，乾清宫，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一日。

花色食品的宴桌。整幅作品惟有女主角的宝座带有靠背且雕饰龙纹，而其他人的座椅均无靠背。紧靠宴桌的右侧设有方凳，一穿朝服者侧坐其上。地平上前方左右摆设梅花，后方摆设松柏。地平下东西摆设牡丹、水仙花各两盆。东西一间各设竖排座位两行，东一间绘穿戴朝服的妃嫔等十人，西一间九人。东二间绘站立者七人，其中两人各怀抱幼儿，另站立儿童三名，总计十二人，背景为一硕大山水画插屏，绘蓬莱仙境、仙女齐集。西二间在对称位置亦设山水插屏，站立者六人，其中三人怀抱幼儿。东尽间为暖阁，檐下摆设中和韶乐之建鼓与琴等乐器，与之对称的西尽间被树木掩盖而没有绘出。殿内墙肩饰有彩色圭文锦花纹。

中段绘殿外月台上场景。正中有一红漆描金龙长案，其上摆设蓝釉荷花纹盖罐一对、绿釉盖罐一对、金嵌宝石壶一对、金卮一个、画珐琅执壶一对、青釉注子一对，以及酒杯、茶瓯之类物品。月台左右各有两个身着金黄色朝服的人，中间又有一穿蓝色朝服的人，关注着十个在月台上嬉戏的孩子。居中的一个孩子手持梅花正在奔跑，以他为中心将其余孩子自然分隔成两组。画面右侧的孩子，一个手举翻跟头小人转架、一个捧着笙，另两个孩子在一旁观看。左侧的一个孩子挑着一挂鞭炮，旁边的一个正在点燃，而后方的两个吓得捂着耳朵，更有一个胆小的远远地躲到了红漆长案的右边。在月台左右最外侧各站立一名三眼花翎侍卫。

下段正中绘丹陛上张设的小型黄布亭子，亭下设红漆描金龙带托泥长桌，其上摆陈金尊、金罍、金卮、金爵，酒杯若干，以进酒。此即清代典礼制度中的“反坫”。反坫的下方设丹陛大乐，可辨识出的乐器有编磬、云锣、大鼓、笙、拍板等。其执事人员身着红色衣裳，前胸、后背饰有方形花卉图案，面向宫殿而立，右11人，左12人，而前方左右各二人面向乐队，应为指挥。丹陛左右边缘则为燕飨乐队及跳喜起舞的人员，可辨识出的乐器有箏、琵琶、三弦等。右33人面朝西，左31人面朝东，呈U字形排列。丹陛下的右丹墀中前排站立9人，后方有22人，手捧、肩扛各式各样物品，或为服役人员。

总计图绘人物约180余人，画法采用中西结合，宫殿、树木、山石等场景为中国画法，而人物特别是面部，则带有西洋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我院文保科技部通过“高光谱”发现，画中东二间站立的女子群像的局部曾做过修改，草图与成稿有所不同。从“高光谱”截图中可见，前排站立孩子的画像后透视出怀抱婴孩女人的袍褶和下摆；前排孩子旁边的矮个女子像下，透视出后边女人宽大的袍袖和马蹄袖。因而前排站立的孩子与矮个女子有可能是后添画的，但改画的技术非常高明，肉眼一点也看不出来，且二人的脸部也没有透视出任何修改的痕迹<sup>〔1〕</sup>〔图二：1、2〕。

〔1〕 此项检验由故宫文保科技雷勇、李广华先生与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合作，利用高光谱仪分析检测完成。图片系雷勇先生提供，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图二〕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局部)

1.高光谱截图,雷勇提供  
2.原图局部



〔图三〕

1.清人画孝庄文皇后朝服像轴(局部) 2.清人画孝惠章皇后朝服像轴(局部)  
3.清人画孝和睿皇后朝服像轴(局部) 4.清人画孝钦显皇后朝服像轴(局部)



## 二 寿者身份的判定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1925年点查该图时,称之为“万寿图大幅一幅”,虽然未具体指明画中主角,但却没有错误。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不知何时将之定名为“清人画颀琰万寿图像轴”,主角明明为女人,却冠为“颀琰”(嘉庆皇帝),显然舛误。

主角头戴清代冬朝冠,身着明黄色绣彩云金龙纹冬朝袍,外罩石青色绣彩云金龙纹冬朝褂,佩戴三挂朝珠(东珠一、珊瑚二),耳饰金龙衔珠珥,面庞清瘦,年届耄耋,到底是谁?从凤冠、耳饰与衣着等级上考察,必是皇后,但清代皇后没有如此高龄者,只可能是太后。而清代皇太后年逾古稀者有昭圣皇太后(太宗孝庄文皇后)七十五岁、仁宪皇太后(世祖孝惠章皇后)七十七岁、崇庆皇太后(世宗孝圣宪皇后)八十六岁、恭慈皇太后(仁宗孝和睿皇后)七十四岁、慈禧皇太后(文宗孝钦显皇后)七十四岁<sup>〔1〕</sup>,她们的画像,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通过图像对比,可知此贴落中所绘太后面貌与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相吻合,而与其他皇太后脸型不同,面貌迥异,毫无关联〔图三〕。

崇庆皇太后画像现存朝服像四幅、半身像屏二幅,另外在《胪欢荟景·慈宁燕喜》中亦绘出皇太后形象,计七幅。分别为故6452,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六旬像轴;故6453,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八旬像

〔1〕 均按清代史书记载,以虚岁计。

轴；故6454，清人画孝圣宪皇后朝服像轴；故6455，清人画孝圣宪皇后朝服像轴；故6456，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半身像屏；故6457，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半身像屏；故9198，牖欢荟景图册。这七幅画像中，其中六幅进行过拍照，方便比对，包括六旬、七旬、八旬不同时期的形象，但现定名中有两幅不够准确，故6452应为七旬像、故6454应为六旬像[表一]。

[表一] 崇庆皇太后画像简表

文物号	文物名称	尺寸(厘米)	图像	备注
故6452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六旬像轴	纵230.5横141		通过图像对比，该图应为七旬像
故6453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八旬像轴	纵228.1横140.5		
故6454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朝服像轴	纵233.5横141.5		通过图像对比，该图应为六旬像
故6455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朝服像轴	纵248.7横116.8		
故6456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半身像屏		无	
故6457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半身像屏			
故9198	牖欢荟景图册之慈宁燕喜(局部)			

〔图四〕1.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崇庆皇太后(局部) 2.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八旬朝服像轴(局部) 3. 清人画孝圣宪皇后朝服像轴(局部)



通过排比崇庆皇太后的画像，发现被康熙皇帝称之为“有福之人”<sup>41</sup>的钮祜禄氏是老来瘦，年纪愈老愈瘦，贴落所绘与崇庆皇太后八旬朝服像、大行皇太后削瘦的面庞极其相像。面庞轮廓、眉眼宽窄、颧骨高度、嘴唇厚薄不分伯仲，惟服饰穿戴上缺少领约〔图四：1、2、3〕。而与描绘崇庆皇太后七旬庆典的《胪欢荟景·慈宁燕喜》相比，均没有绘出领约，服饰穿戴相同，所坐雕龙宝座亦相似，惟面貌削瘦，故可判定此贴落主角为崇庆皇太后(孝圣宪皇后)。

一旦确定了主角的身份，其余人物的身份也就迎刃而解。太后宴桌右侧身着冬朝袍、外罩袞服侧坐于方凳者无疑为乾隆帝，方凳的摆放位置与《胪欢荟景·慈宁燕喜》中所绘一模一样，这是皇帝专用的方凳，也只有这个方凳设在高高的地台之上。位于万人之上的皇帝在皇太后面前也要自称为“子臣”，其宝座在皇太后面前自然退变成方凳。而东西二间中穿朝服坐于前排者为乾隆帝妃嫔，坐于后排者则可能有个别的公主、福晋等，月台上着金黄色朝服站立者为皇子，嬉戏的孩子为小皇子及皇孙，东西二间被抱着的孩子中则可能有曾孙<sup>42</sup>。

### 三 贴落的创作时间与作者考察

既然该图所绘崇庆皇太后形象与八旬朝服像高度吻合，那么该图很可能就是崇庆皇太后八旬庆寿图。通常情况下图绘皇帝、太后的御容或内庭主位的喜容，多由皇帝下旨交办，在造办处活计档中也会留有记载。经过查找乾隆朝活计档，幸运地在皇太后八旬庆典之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档案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基本可以确定该图的作者为姚文瀚、周本、伊兰泰，作品由姚文瀚负责起稿，周本、伊兰泰承担绘画。具体时间则为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乾隆帝钦点姚

〔41〕 康熙六十年，雍亲王曾请父皇康熙帝幸狮子园进膳，据乾隆帝自述：“是日皇祖指予谓皇妣孝敬宪皇后曰，带其生母来见，皇祖连谓之有福之人”。详见《清高宗御制诗集》五集卷九一，《游狮子园》诗注。

〔42〕 乾隆三十二年秋行围时得“曾孙之喜”，“即驰使奏闻圣母以洽慈禧”。详见《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六八，《即事》诗注。

文瀚起稿，次年十二月初一日完成，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经托裱后即贴在专用于皇太后庆寿筵宴的寿安宫中。

有关该图的档案记录有如下三条：

(1)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十一月二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慈宁宫大画一幅，着姚文瀚画。钦此。”<sup>①</sup>

(2) 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五月二十一日将姚文瀚起得寿安宫大画稿一张呈览，奉旨：“着周本、伊兰泰画。钦此。”<sup>②</sup>

(3)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十二月初一日太监胡世杰交寿安宫白绢画一幅，传旨：“着交启祥宫，镶二寸蓝绫边托贴。钦此。”<sup>③</sup>

虽然在这三条档案记载中都没有提到皇太后或八旬万寿图的字样，且所述地点不一，那么如何判定三条档案所指的是同一幅绘画，即本文所探讨的“故6541”呢？这里，最为重要是需要透过历史背景去加以考察和分析。三条档案有一共同点，都是“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李文照时任造办处如意馆郎中，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庆典期间恰在御前行走。造办处档案载：“十一月十一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十月初十日郎中李文照面奉谕旨：朕在圆明园，着李文照在如意馆伺候，进宫时寿安宫伺候；六格在启祥宫伺候。如意馆无人照管，着笔帖式舒庆暂且在如意馆监视活计。俟万寿后，照旧换班行走。钦此。”<sup>④</sup>可见李文照由皇帝指名留在身边，随侍左右。从时间上看，传旨日期为十月十日，谕旨中的“万寿”，指即将来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皇太后八旬万寿节，而寿安宫则是庆典的重要场地，所以“进宫时寿安宫伺候”。第一条档案中所说“慈宁宫大画一幅”，不是指慈宁宫所用，而是绘画慈宁宫庆寿的场景，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于慈宁宫侍皇太后宴，活计档中记载传旨的时间为十一月二十九日，距离慈宁宫侍宴只有短短的四天，主角、主语上上下下都非常明白，无需特别指出。第二条档案记载，时过半年，姚文瀚的画稿完成，呈皇帝御览后很是满意，没有修改意见的记录，只是传旨，“着周本、伊兰泰画”，而伊兰泰正是协助艾启蒙绘皇太后八旬朝服像之人<sup>⑤</sup>。在这条档案中称“姚文瀚起得寿安宫大画稿”，是指绘画将要贴落的地点。第三条档案又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下简称《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4册517页，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如意馆，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 《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5册409页，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如意馆。

③ 《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5册430页，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如意馆。

④ 《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4册506页，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如意馆。

⑤ “查得大行皇太后八旬圣容系艾起蒙绘画，其朝冠服伊兰太、王儒学绘画。此次大行皇太后圣容仍请着伊等绘画……”详见《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0册375页，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四日记录。

时隔半年，“交寿安宫白绢画一幅”，仍称“寿安宫”，而此处“镶二寸蓝绫边托贴”之句最重要，因为按照惯例，贴落大画才镶二寸蓝绫边，小画只需镶一寸蓝绫边。

该图人物面像的渲染带有明显的西洋画法，却没有找到西洋画师绘画的记录，推测是由学过西洋绘画的中国画师所为。那么，主笔者姚文瀚有此能力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帝画像中，《弘历紫光阁赐宴图》、《弘历春原阅骏图》、《弘历鉴古图》均为姚文瀚所绘，且姚文瀚又与张为邦合绘过《冰嬉图》，具有经营布局、掌控大场景的丰富经验。据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十九日粤海关送到西洋颜料三十六瓶，谕旨：“西洋颜料着如意馆收贮，准西洋人并姚文瀚、方琮等应用。”<sup>①</sup>中国画师只提到两人，姚文瀚排在第一。另一位贴落的参与者伊兰泰，也有多次协助西洋画师绘画的履历。值得一提的是，聪慧的姚文瀚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大贴落画的起稿任务，并且巧妙地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画上，在画幅上方东二间陈设的山水画大插屏上，署有“臣姚文瀚恭写”的字样〔图五〕。

〔图五〕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臣姚文瀚恭写”署名



慈宁宫作为皇太后礼仪性宫殿规格最高，庄严肃穆，除大典临御外，平日里并不使用，大画并不适宜贴落于此。该图在表现慈宁宫庆寿场景时，山水绘画是以大插屏的形式陈设在东二间与西二间，应该说是临时性的年节陈设，这一点表现在绘画中也是属于写实的。与慈宁宫相比，寿安宫的建筑功用则为庆寿称觞之地，充满了喜庆欢乐。乾隆十六年(1751)，为迎接皇太后六旬大寿，“先期修葺寿安宫为奉觞之所”，届时“皇帝率皇后、皇子、皇孙等侍皇太后于寿安宫称庆，凡九日”<sup>②</sup>。二十六年(1761)，将寿安宫再次修整，“新葺为皇太后七旬万寿庆祝之所”<sup>③</sup>，“添建戏楼并造办地涌金莲、开花见佛……各样台图、台幔、云兜等项共五百二十七件”<sup>④</sup>，“皇帝率皇后以下暨皇子、皇孙称庆于寿安宫，凡十一日”<sup>⑤</sup>。三十六年(1771)八旬万寿，“寿安宫殿宇油饰见新，并戏台西边添建寿山亭台”<sup>⑥</sup>，于此庆贺。庆寿期间乾隆皇帝要亲定每日食品，连续多日于此亲侍皇太后进膳，从早膳、小膳、晚膳直到酒膳，皇后率皇贵妃以下皇子、皇孙咸侍。戏台上届时上演连本的承应寿戏“九九大庆”，皇后妃嫔、皇子皇孙、王公宗戚、诰命妇人等齐集于此恭祝皇太后万寿，“王公、满汉大臣、侍

① 《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5册404页，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如意馆。

②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五，上册页85—8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 《国朝宫史》卷四，上册页62。

④ 三和等：《奏为寿安宫添建戏楼修理地涌金莲事片》，乾隆三十年十月十三日乙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277—143。

⑤ 《国朝宫史》卷五，上册页86。

⑥ 《军机处和图利档》，《清官述闻》页938，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卫、外藩、回部于东配殿，王妃、公主、命妇于西配殿，各以次列坐观戏，恩赐酒肴果实”<sup>41</sup>，热闹非凡，万寿图于此贴落最为恰当。

## 四 图像的历史价值

该画构图并非完全写实，而是虚实相间，背景中点缀的树木、山石、花卉，甚至于宫殿屋顶、屋脊上排列的兽头均随意而画，但所绘人物写实，场景写实，具纪实性，仍属于宫廷绘画中的纪实性绘画，其历史价值明显高于艺术价值。

纪实性绘画是以绘图的形式记录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人物、场景的安排忠于历史，特别是在礼仪制度的表现上更为直观、形象。如会典中记载的关于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反坫的摆设位置，相关人员的穿戴服饰，会典中的说明文字虽然详细，但仍不如绘图给人一看即明的效果。

按照清代的礼仪制度，崇庆皇太后临御的最高等级的宫殿就是慈宁宫。乾隆三十四年(1769)为迎接皇太后的八旬庆典，特将慈宁宫的屋顶结构从单檐改为重檐，以示尊崇。该图不仅没有绘出重檐，甚至于将屋脊的走兽画为莲花式，但并不妨碍所绘宫殿为慈宁宫的认定。黄色琉璃瓦大殿七间，五明两暗，这是慈宁宫最明显的标志。如果仅从屋脊的莲花式装饰便认为所绘非紫禁城内，而是离宫别苑，便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皇太后在紫禁城内居住的宫殿是黄琉璃瓦五间的寿康宫，居住离宫别苑时，无论是畅春园的春晖堂、寿萱春永，圆明园的长春仙馆，还是避暑山庄的松鹤斋，均是灰瓦建筑<sup>42</sup>，更何况与皇太后相关的元旦、冬至、万寿庆贺礼以及上徽号、进册宝等重要典礼都要在宫内举行。

该图所绘的宫殿是慈宁宫，表现的时间则为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高宗实录》载：“辛酉(二十五日)……上诣慈宁宫侍皇太后宴，彩衣舞，奉觴，皇子、皇孙、皇曾孙、额附等以次进舞。”<sup>43</sup>《起居注册》记载更为详细，连时辰都非常明确：“巳刻(10点)，慈宁宫侍皇太后筵宴，亲捧进御赞玉蟠桃一件。上彩衣躬舞，捧觴上寿。”<sup>44</sup>此贴落图绘场景定格在彩衣躬舞、捧觴上寿之后，乾隆帝已经落坐，众妃嫔也已落坐，绘画写实的细节在于皇帝与妃嫔的坐姿，他们众星捧月一般，朝向皇太后的方向，一律采用侧坐的姿态，表现出对皇太后的尊崇与礼遇[图六：1、2、3]。

该图的写实性还表现在对妃嫔的描绘上，透过服饰颜色与纹样的差异，根据《皇朝礼器图式》的记载与描绘，可以分辨出妃嫔的等级。同时参考当时的宫廷主位状况，可以断定东一间妃嫔中

41 《国朝官史》卷七，上册页121—122。

42 参见贾珺：《清代离宫御苑中的太后寝宫区建筑初探》，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页33—44。

43 《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七，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辛酉。

44 《起居注册》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下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

最靠近皇太后的一位，应是嘉庆皇帝颀琰的生母，皇贵妃魏佳氏。因为乾隆帝只册封过两位皇后，孝贤皇后富察氏与皇后乌喇纳喇氏，前者于乾隆十三年(1748)因病去世，后者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抑郁而亡。

〔图六〕1.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的乾隆皇帝 2.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坐于东一间的妃嫔 3.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坐于西一间的妃嫔



而魏佳氏于乾隆三十

年(1765)六月晋皇贵妃，四十年(1775)四月去世，六十年(1795)立颀琰为皇太子时，才追封为孝仪皇后〔图七：1、2、3〕。按照清朝定制，皇太后、皇后、皇贵妃冬朝袍“色用明黄”<sup>1)</sup>。其朝服颜色比同坐一行的其他四人的朝服颜色更为鲜亮，应是明黄色与金黄色的差别，朝冠、金约上所饰金凤与东珠的数目也多于他人，且彩帔饰有“五谷丰登”纹样，均符合皇贵妃定制<sup>2)</sup>。皇贵妃按定制仅设一位，在皇后虚位的情况下，摄六宫事，在妃嫔中的地位最高，依据礼制，占据东边的位置。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的妃嫔中位居首位的正是皇贵妃魏佳氏，其后依次为庆贵妃陆氏、愉妃珂里叶特氏、舒妃叶赫那拉氏、颖妃巴林氏、豫妃博尔济吉特氏、容妃和卓氏、婉嫔陈佳氏、慎嫔霍硕特氏、惇嫔汪氏等。位于西一间最靠近皇太后的一位即庆贵妃陆氏，她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晋为贵妃，三十九年(1774)七月去世。抚育过嘉庆帝，清宫留存的一幅从圆明园思永斋揭下的大贴落画中，即绘有她照看幼年颀琰的形象〔图八：1、2、3〕<sup>3)</sup>。在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其朝袍图绘为金黄色，不易分辨，但朝冠、金约上所饰金凤与东珠的数目多于他人<sup>4)</sup>，彩帔中同样有“五谷丰登”纹样，由此显示出其贵妃的身份。而其他妃嫔的彩帔都是花卉图案，只有魏佳氏与陆氏的彩帔为“五谷丰登”，与清代服饰的规定完全吻合。另外在西一间坐在后排的妃嫔中有一人与众不同，

1) 《皇朝礼器图式》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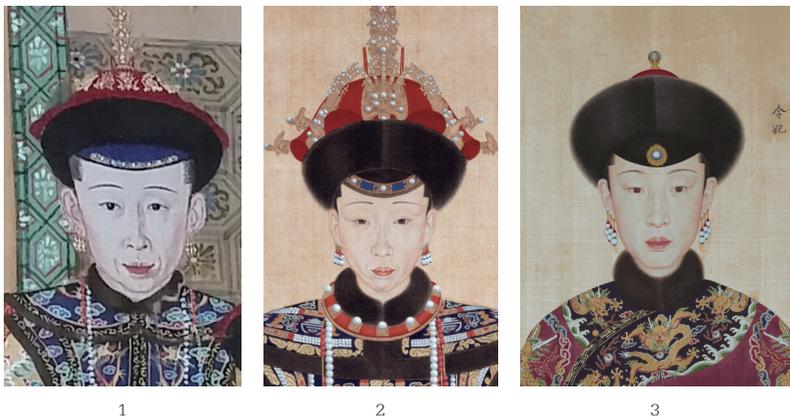
2) 《国朝官史》卷九记载，皇后、皇贵妃、贵妃的彩帔“绣五谷丰登”，妃则绣“灵芝瑞草”。《皇朝礼器图式》卷六有同样记载。

3) 〔图八：2〕为故6539，文物名称为弘历妃及颀琰孩提像，纵323厘米，横184厘米。在颀琰的身旁，贴有黄条“今上御容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敬识”，画幅背面标明“思永斋换下”。寿皇殿旧藏，参考号为咸一160，《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登记为“庆恭皇贵妃容及嘉庆御容”。

4) 《国朝官史》卷九记载，皇贵妃、贵妃朝冠“红缨上周缀金凤七”，金约“周围金云十二衔二等东珠各一，间以珊瑚”。妃朝冠“缀金凤五”、嫔“缀金翟五”。贴落图上所绘非常写实。

【图七】

1.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的皇贵妃魏佳氏
2. 清人画孝仪纯皇后朝服像轴(局部)
3. 心写治平图中的令妃



【图八】

1.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的庆贵妃
2. 清人画弘历妃及颀琰孩提像中的庆妃
3. 心写治平图中的庆嫔



【图九】

1. 清人画弘历塞宴四事图中的容妃
2. 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中的容妃



因为穿戴特别显眼，应是容妃。她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入宫，五十三年(1788)去世。十年前刚刚入宫时的容妃被描绘在《弘历塞宴四事图》中，就穿戴着维吾尔族服饰，英姿勃发，而此时的容妃仍然穿戴民族服饰，但面容明显苍老[图九：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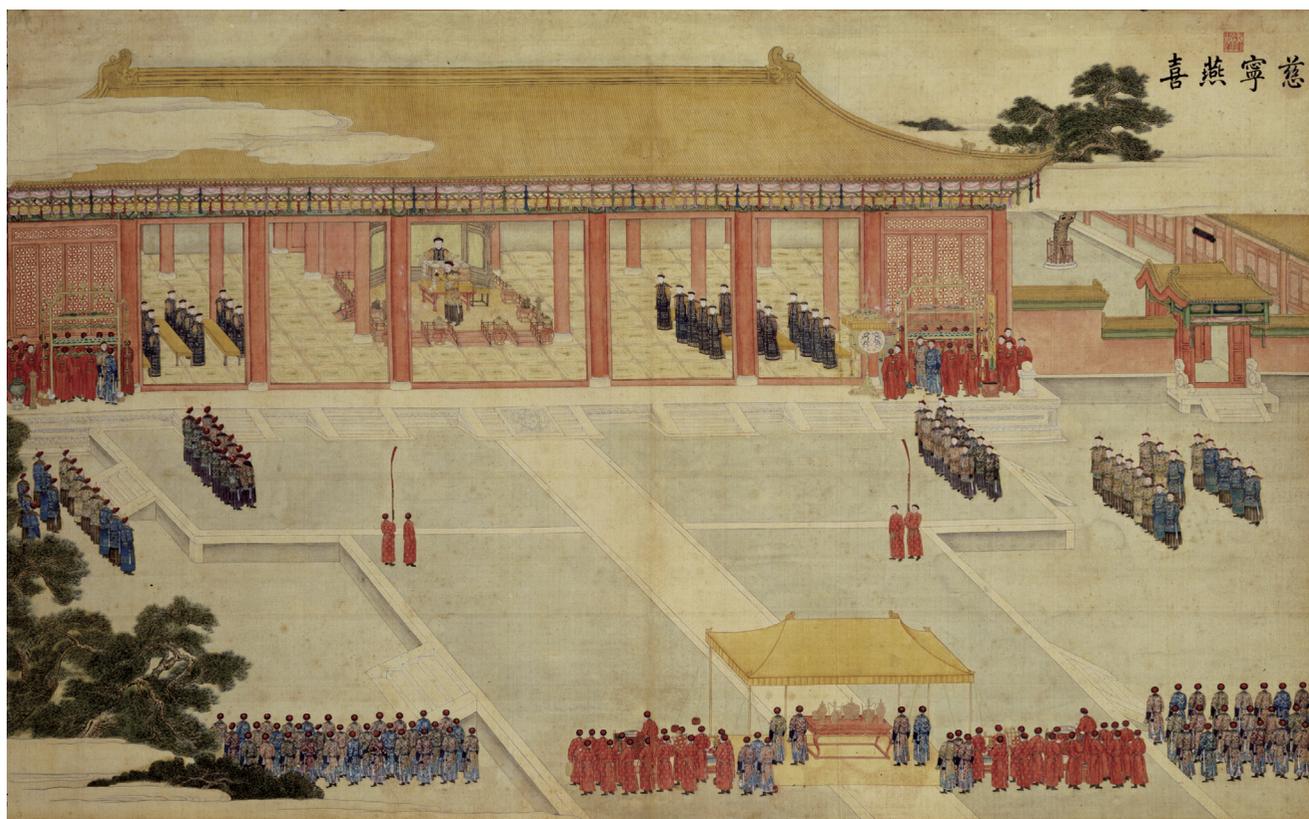
崇庆皇太后七旬万寿庆典所绘慈宁燕喜与这幅八旬万寿庆典图同样表现慈宁宫庆寿的场景，传递的信息却不尽相同。前者图绘皇帝捧觞上寿正在进行中，场面庄严肃穆[图十]；后者定格于仪式之后，更像一幅皇家的全家福，五代同堂，其乐融融。屋里的主位们都已坐下，皇孙们在月台上追逐嬉戏，乐队也已经演奏完毕，所有人都非常放松，屋内屋外荡漾着一种放松欢乐的气氛。

## 余 论

该图除了乾隆朝活计档中所记“慈宁宫大画一幅”、“寿安宫大画稿一张”、“寿安宫白绢画一幅”之外，在乾隆朝有无正式定名？经过细致考索，发现同治二年《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中的一条记载或许与该图相关，“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管王承义交嘉庆图一卷，系由寿康宫二层殿请出”<sup>〔1〕</sup>。此黄册以时间顺序排列，依次记载景山寿皇殿收藏的清代帝后画像，始于太祖高皇帝(努尔哈齐)，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孝庄文皇后，世祖章皇帝(顺治帝福临)、孝惠章皇后、孝康章皇后……止于穆宗毅皇帝(同治帝载淳)、孝哲毅皇后。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管王

〔1〕 《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同治二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陈394。

〔图十〕觴欢荟景图册一慈宁燕喜（故9198）



承义交嘉庆图一卷，系由寿康宫二层殿请出”的记录，夹在文宗显皇帝（咸丰帝奕訢）、孝德显皇后与穆宗毅皇帝（同治帝载淳）之间，值得深入思考。首先，陈设档一般是照抄旧账，历朝沿袭，在此基础上注明所陈物品的增减变化情况，甚至于将时间、地点都详细记载。也就是说这本黄册的底账是乾隆年间设立的，因为乾隆十三年（1748）重建寿皇殿，十五年将太祖、太宗、世祖圣容从体仁阁移往寿皇殿，从而确立了寿皇殿元旦合祭列圣列后圣容的制度，因此这本始于太祖的黄册之底本肯定是乾隆十五年之后的产物。其次，《嘉庆图》的初始记载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嘉庆图一卷”，“由寿康宫二层殿请出”，虽然黄册中没有对《嘉庆图》进行详细说明，但寿康宫系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为母亲而特建，皇太后在此居住了42年，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1）去世，可见此图与崇庆皇太后相关。第三，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由雍和宫后佛楼金塔内发现的“世宗宪皇帝圣容一尊（御案上供奉）、世宗宪皇帝圣容三轴一匣（西大柜）、笔墨双妙册页一册（西大柜尊藏）、册页二张（西大柜尊藏）、御容十二张（西大柜尊藏）”<sup>〔1〕</sup>送至寿皇殿收藏，在黄册中被排列在孝圣宪皇后之后。而《嘉庆图》却没有并入孝圣宪皇后画像中，恰恰说明此图不好排序归类，因为太后、皇帝出现在同一幅图像

〔1〕 《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同治二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陈394。

上，归入孝圣宪皇后画像，还是高宗纯皇帝画像，皆不合适，只能排在册子的最后。第四，在同治二年的档案中出现同治帝后的画像，表明光绪年间是在这本黄册上续记，没有另立新册，因而《嘉庆图》的记载夹在了孝德显皇后与穆宗毅皇帝之间。

乾隆五十五年定名的《嘉庆图》，是指美好(吉美)隆重的庆贺典礼，与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图切题，而与嘉庆皇帝无涉。估计原图背面很可能曾粘有黄条或附有纸条，标注出与“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管王承义交嘉庆图一卷，系由寿康宫二层殿请出”相关的信息。

该图贴落与收藏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过几次变迁，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最初贴落寿安宫到移至寿康宫<sup>31</sup>，乾隆五十五年(1790)又从寿康宫二层殿请出，其后进入寿皇殿收贮，因为过大而没有像其他画像那样注明是放在西大柜还是东大柜尊藏<sup>32</sup>，晚清民国时又从寿皇殿入藏乾清宫。当时从寿皇殿移入宫中的画像不止此一幅，地点也不仅限于乾清宫。如在《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登记在册的高宗纯皇帝《盘山静夜图》、《殪熊图》、《刺虎图》，仁宗睿皇帝《芳庭诗思》，穆宗毅皇帝《游艺怡情图》，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时均藏于乾清宫，而两幅《孝圣宪皇后御容半身像挂屏》中的一幅就发现于寿安宫<sup>33</sup>。

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故6541号”文物，原定名“清人画颀琰万寿图”，实为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绘画者为姚文瀚，故应更名为“姚文瀚画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贴落”。该图的新发现，不是简单地新增加了一幅崇庆皇太后画像的问题，而是加强了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的完整性，弥补了原本的缺憾，特别是在原计划由徐扬绘皇太后八旬万寿图四卷未完成的情况下<sup>34</sup>，更堪称珍贵。该图以贴落的形式出现，同时也增加了有关崇庆皇太后绘画的一个新品种。该图与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图卷》，七旬《肱欢荟景图册》交相辉映，必将载入历史的史册。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责任编辑：张 露)

31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寿康宫中贴落该图的档案记载，何时移入寿康宫待考。

32 在《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中，一般画像在品名之后，以小字注明在“西大柜尊藏”、“东大柜”或“东小柜尊藏”等。

33 《盘山静夜图》、《殪熊图》、《刺虎图》、《芳庭诗思》、《游艺怡情》的参考号均为“天”字号，而《孝圣宪皇后御容半身像挂屏》的参考号为“阙”字号，代表乾清宫与寿安宫。

34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监如意传旨：“着徐扬起万寿庆典图四卷呈览。钦此。”四十一年六月初三日董五经交宣纸四张，传旨：“着徐扬画皇太后万寿图。钦此。”详见《造办处档案总汇》册35页393、册39页788。按照六旬、七旬万寿图呈进的惯例，八旬万寿图卷将在四十六年皇太后九旬大寿时呈进，自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五月徐扬忙于绘制《南巡图》一二卷，而四十二年正月皇太后离世，万寿图四卷实未完成。